

赵

ZHAO

昌

CHANG

平

PING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

跨

赵 昌 平 著

世

纪

学

人

二

存

选

集

跨世纪学人文存

赵昌平

自选集
赵昌平 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赵昌平自选集
赵昌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4.25 插页:2 字数:329千字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ISBN 7-5633-2487-9/I·222

定价:(平)26.00元
(精)34.00元

丛 书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化	王铁崖	张岱年	张政烺
李学勤	陈岱孙	周一良	季羨林
费孝通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 80 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 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尚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蹈厉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自序

一场所谓“文革”的浩劫，打乱了我北大中文系的学业，却也使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次与唐人相仿的出塞经历，分配至内蒙军垦，途经居庸关时不禁吟出：“冻云迷塞北，落日照长城。”我自幼喜爱唐诗，而从此以后，诵读唐诗，在我更有了百代相照，切肤关心的感受。从诗篇的音节藻绘之中，我渐渐更能体会到一部唐诗史中蕴涵着四唐文士的心史，先秦以来中国士人最主要的性格心理特征，此时有了最丰富的表现与融合；而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与思维形态上，仍经常地重奏着千载前先辈的曲调，历来说，唐诗是中国诗歌艺术的顶峰，我以为这应当不仅是指诗格诗艺上的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法门；也应当包含唐人心态在中华民族心理历程上的典型意义。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成熟期，也是民族心理的长成期，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着这种感觉，在“文革”结束后，我选定了唐代文学专业，师从华东师大施蛰存教授，开始了对唐诗的系统研究。

学术研究固然是一种个性特征极强的活动，但又总与一定时期的文化氛围，与此一学科的历史状况相联系。为此，在阐述我的有关看法前，应先对“文革”以来，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基本动向作一概略性的介绍。

“文革”后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大抵是在对“文革”前有关观点的

反思与批评中起步的,唐诗研究也如此。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对中科院文学史、游国恩文学史,特别是对刘大杰文学史(修订本)唐诗部分的批评,吸引了学者相当大的注意力,虽然冷静地反省一下,当时的批评往往不免偏颇——三史自有其独到的创获与相应的历史地位——但这些批评所引出主题,却对此后20多年的研究具有深刻影响。批评精神由对三史的质疑,扩展到对历代唐诗研究成果的重新审视,重新评价。一方面,研究的个性化成为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地认识到,应将唐诗史作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史来研究,而不能再让它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描述出唐诗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不能止于单个的作家论。这两方面合起来,可称之为对诗史本质特点的历史性的探寻。嗣后近20年的种种理论探讨,大抵由此而引起。

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过去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近现代西方文论纷至沓来,启发了唐诗学界从种种新的视角来研讨上述问题;而更可贵的是,与其他某些学科不同,唐诗学界较少后来被批评为肤廓、简单化的,以某种西方文论模式代入国学研究的幼稚倾向,这不能不归因于这一学科丰厚的历史积淀。

在中国古典文学范囿中,没有一块土地似唐诗那样被反复耕犁过千百度。任何清醒的学人,都无法不正视前人的累累成果;任何刻意标新立异而实学欠缺的论说,也都会因此而立即显出它的浅薄来。一方面努力从借鉴外来理论中更新视角,另一方面不懈地操练“内功”,重视资料的发掘、梳理、考订,并力图将中西学融通,成为“文革”后唐诗研究方法的主流。这里不能不提到两种“文革”结束后问世的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是一部对诗人或诗人群体进行集合性考证的力作,它将中国传统的考证学与丹纳《艺术哲学》的一些核心思想结合起来,将诗人尤其是诗人群看作诗史的实际承担者,企望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诗人群的行迹动向的考证,来为探究唐诗各时期特征提供基础。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则在广阔而翔实文化背景的勾画中,结合对杜甫行事的补订,更深刻地讨论了杜甫诗的内涵、成就与成因。虽然人们可以指出这两部著作的某些不足或疏失,但两者无疑都表现出“文革”期间唐诗学者在极其困难的境遇中沉潜学术的可贵毅力,从而为“文革”后大陆唐诗学研究开了一个良好的头。几乎成为

共识的是：必须以对背景资料与文本的尽可能详密的考订与梳理作为基础，来支撑新视角的开拓。因而在20年中唐诗学界考订与诗史研究一直呈现同步共盛的形态。《丛考》之后诸如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及其主编的《唐才子传笺证》，吴汝煜《唐五代诗人交往诗索引》，周勋初主编《唐人佚事汇编》，郁贤皓《唐刺史考》，徐敏霞、王桂珍点校《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郁贤皓、陶敏《元和姓氏纂补订》，陈尚君《全唐诗补编》，陈伯海《唐诗汇评》，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数十种唐集整理校注本，充分显示了前者的成就；而1992年8月吉林中国诗史诗论研讨会上总结的“寻求宏观与微观汇通”等观念，早于80年代中期，在唐诗学界就已有了不俗表现，更说明其理论思维的成熟。这两方面相互影响，既促使史科学带有文化学的色彩，更使得理论探讨始终保持民族特性。由此进一步构成了唐诗学界根基扎实、大处落墨、气势浑厚的特点。

在一应新思潮中，对后来影响最著的是历史文化背景论和语言学批评的有关思想。代表前一种影响的重要著作有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与陈允吉先生的《唐音佛教辨思录》。前者与傅璇琮先生的《丛考》视角相近，却由诗人群的交游更深入探讨共同的文学趋尚；后者则敏锐地从佛学思想深入唐人生活这一重大文化现象契入，开始探讨它所引起的唐诗人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的变化及由此而产生的诗歌题材与风格的转化。以语言学批评思想研究唐诗的专著虽未出现——这应当与它同传统诗论的距离过大有关系——但潜在的影响则同样深广。其注重由语言结构解读文本的观念，被人们广为吸纳，并经常与历史文化背景的研讨结合起来，而使传统的研究方法得到深化。程千帆先生、葛晓音女士的大量论文很能显示这方面的成果，后来分别结集为《被开拓的诗世界》与《汉唐文学的嬗变》。我自己的研究，大抵也反映了这一动向。

以上研究成果，实际上已显示了这样一种必然趋势：研究者由对历史文化背景论与语言学批评的比较、借鉴与批评中，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影响诗歌发展的外部因素与诗歌内在因素两方面的研究融合起来。因此从80年代末迄今，对所谓“思想材料如何实际地进入文学作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语）的问题的探讨，在唐诗学界进入了实质性

的阶段,人们普遍关心两者之间的中介是什么。这就必然使研究风气从新思潮涌入时注重宏观体系的架构,回归到对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第二次研究”上来。有识见的研究者,都不亟亟于构成体系与从事涵盖性的专著,而力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去探寻具体问题的更深层的内涵,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抽绎出诗史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表面上看来,这一时期较少前一时期那种集中探讨某一理论问题的大规模学术活动,而实际上“冷静”的背面,却蕴含着更深刻的理论思考与更丰厚的素养积淀。这是大陆唐诗学界更趋成熟的表现。相信今后若干年中的趋势是:(1)史料学将在更广的层面上,更深入地、更具有文化意味地展开;(2)一些迄今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侧面,如唐人诗格著作、唐诗音韵学等等将会越益为人们重视;(3)随着对以上中心问题的不懈探讨与个性化研究,会出现更高质量的专题著作与多种唐诗史,从中甚至可能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学派,而一批较我们更年轻的学者将会承担重要角色;(4)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诗学的建构,也将在以上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

现在可以具体谈谈我自己的有关观点了。

一、唐诗研究的基础——感觉、资料与理论思维能力

诗史研究自然必须有明晰的理论思维能力,有某种视角;但对文本的敏锐感觉与对背景资料的切实的尽可能全面的掌握更是进入研究的前提。

“观千剑而后识器”,由于诗歌的魅力,在于它有“1+1大于2”的效果,因而吟哦记诵之际所获得的超乎文字之外的独特感觉,将是以后进入研究时的“主心骨”,唯有在具备大量研阅记诵基础上所形成的这种敏感性后,才能不致在纷杂的外部材料与种种的理论框架前失去自我。业师施蛰存教授与马茂元教授都不约而同地命我习作古体诗文,并对我进行过这种训练:随口吟诵一诗,让我凭感觉判断是属于哪一家数的。这使我后来得益非浅,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辨别同异,从反覆研诵、比较此诗人(群)与彼诗人(群)的异同——同中异,异中同之中,来探寻诗派的区分、承创覆变的轨迹。语言学批评最重视感觉,这其实与传统的治学方法可相互借鉴。

所谓掌握背景材料是指对历史文化背景,前此的诗史资料与唐诗

人及其群体的行止、行为特征的尽可能详尽的把握。为此,掌握校勘、考订、笺注等传统功夫是必不可少的。就我的经验而言,系统地整理一个有代表性的诗人的集子、制定年谱,并由此而连类旁及熟悉周遭诗人,以交互验证,发掘材料,最有利于深入他们活动的背景,对以上各方面作综合性的思考。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1)注意每一时期历史文化背景诸因素的主次地位与交互作用,从中感受到时代的总体氛围;(2)注意前此诗体演进的历史状况;(3)学慎始习,要尤其注意每一诗人初入诗坛时的个性特征与把握当时诗坛注意的中心问题,并结合以上二点,考察其交互作用。在我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对背景材料的梳理审订大致占了三分之二的的时间,比如,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唐诗各体的成因,一度回过头来,以近二年的时间对六朝诗作了较系统的再研究,其中有关六朝自然观与诗文骈俪化关系的寻索,对我后来研治唐诗史具有总体性的影响。

只有具备了以上两项基础,视角或说理论模式方有实际意义,也因此会悟到,虽然治史必须有视角,但面对活生生的诗史现象,任何理论模式都相对地显得贫乏,而往往顾此失彼。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终于悟到,涵盖一切的唐诗史,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境界;但反过来看,在具备了以上两项基础后,从任何视角出发的研究,都因能从某个侧面反映本质的一部分而有其存在的价值;在诸多研究者,诸多视角的透视与相互碰撞中,人们才能逐步认识诗史的方方面面,诗史的研究也才永远不会划上句号。明白这一点——明白自己的研究永远只有相对的意义,对研究者来说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会促使你将根本的注意力放到基础能力的培养上,从而在感悟中形成自己对诗史的独特却是有根有攀的解悟,这时你再面对各种理论都不致邯郸学步,而会作出以我为主的取舍,从而丰富自己的研究个性。这是一个二律背反。诗史研究要无执而又有执:因悟通上述道理而首先无执于一定的视角,再反过来从具体的感悟中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个性一旦形成,就应有所执著而不随风摇摆;但这并非固步自封,却应在更深入的感悟中,对自己的理论模式作修正、补充,不断地建构。感悟是理论建构永恒的前提,理论建构永远须与感悟同步进行而修正、深化。下面我所要谈的一些理论问题,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二、意兴、意脉、意象——唐诗的本质与魅力

在重视感觉这一点上我与语言学批评的观念相当接近,但对如何去感觉,看法却颇有不同。近现代语言学诗歌批评的标的是近现代印象派之类诗歌,而唐诗,即使是外观上最接近印象派的晚唐温李一路的诗歌,在本质上也只是接近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国画而绝非与马蒂斯、塞尚同品。明确中国诗与西方近现代诗歌的内质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语言学批评的观念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我的有关观念、详见《意兴、意象、意脉》一文(《唐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这里只能挈其要点。

语言学批评所谓“原初的萌动”,在唐诗中也有极生动的表现,但却有所不同,这最鲜明地体现于唐人有关意兴的说法之中。兴即兴起,是诗人为外物所偶然引动而突然产生的创作冲动。其表层是一时一地的直觉的感受,而深层则是诗人长期以来积郁的情思。所以唐人论“兴”必与“意”相关,即所谓“兴发意生”,“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而进入一种特定的创作境界。由于抒情言志观念的根深蒂固与因佛教思维介入而更为强化了的中国人的证悟式的艺术思维形态,唐人在“兴发意生”后,不是任由感情冲涌以成篇章,而总是通过潜心观照,求得心物相印、传神写照的妙合境地。这就是所谓“精炼意魄”与“凝心击物”(以心意对物象进行筛选)二者融一的过程。于是原初朦胧直觉中的潜在意念伴随着精选的物象而逐渐趋向意旨化。在唐人诗论中这便是所谓因象立意的“取境”过程。片断的景象,在图画中是平面地展开,而以意韵为灵魂;在诗中则是线性地延展,而贯串其中的便是所谓意脉。意兴是灵魂,意脉是血脉,意脉流注于物象之中,使物象升华而具有意象的品格。意脉通俗点说是覆盖于片断景象下的似断而续的感情线,是经过“文体开阖作用”(结构功夫)而艺术化了的感情线。一方面是意立气生,气动为势,以气势主导文体开阖;另一方面,反过来看,便是借文体开阖作用以显气势,于萦回盘礴,草蛇灰线之中隐见作者之措意。这便是唐人创作论之精髓。而唐诗的魅力正在于那种意旨性与朦胧性,具体性与性质化并存,富于味外之味的境界。在对片断景象的赏味中,玩索那似断实续的意脉,从而体味诗人的意兴,便是阅读唐诗文本的关键。

三、诗体传统、时代、诗人及其心态——唐诗演进的形态

所谓唐诗的演进形态,其实只能是研究者由一定视角出发的描述,而决不可能包含其实际形态的全部。多年来,在探讨历史文化背景因素如何进入作品而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要问题时,我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唐诗演进形态的一些看法。

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总是处于纵向的诗体演进的历史长河与横向的历史文化背景交汇点上,并由某一契机引发而进行创作的。因此背景因素之进入诗作内容的中介应由诗人自身寻找。由对“意兴、意脉、意象”的研究中。我进一步悟到这中介应是每一诗人的特定心态。除少数为一定理念而作的诗歌(如元白新乐府),思想直接明确地介入作品外,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介入是间接的,隐微的。诗人不断以自己的个性感知着背景因素,并在动态的过程中对之做个性化的建构而积淀于意识深处,遂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与情志趣味。成为其创作之前潜在的意念与审美情趣。一旦情景泊然凑合,兴会标举,诗思奔凑,便通过他以为相宜的,一般也是他所熟习的诗体来进行创作。这时诗歌语言作为其意兴的载体,通过意脉的整合被组织到诗体之中,呈现为特定的体德风貌。每一次这样的创作都既承继着某一前此的诗体特点,又渐积地丰富着并局部地改变着这种诗体的风貌。在我看来,诗体也是有“生命力”的。每种诗体在表现力上存在一种潜能,诗人个性化的创作,正是对这种潜能的不断开掘与实现。往往是经过众多中小诗人前后相继的努力,至某一大诗人手中——他经常是处于最佳机缘上——而由渐变中产生突变,使某一诗体发生明显的演进。这一过程的螺旋形往复便描下了诗史演进的轨迹。应当注意的是诗体传统、时代、诗人三元的关系处于复杂的状态之中,不同时期,三者影响诗史进程的主次地位会有所不同,因此,我目前正在撰写的《唐诗史》并不以三元中的任何一元作为固定的主线,而采取了一种多元化的写法。研究每一时期时,力求在综合考察三元的交互关系中发现当时诗坛某些最有本质意义的关注点,与促成此一关注点解决的最主要的动因及解决的具体形态。因此,大体而言,我的视角可归纳为:以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为背景,以诗人的心态为中介,以诗体的传承演变为归结的多元化的动态的视角。但由于每一时期三元主次地位的不同,其各自的内在构成情况更不同,所以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并无一成不变的规则可循,而总是以感悟为根

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海内外不少友人问我的《唐诗史》为何不能快点写出来,借此机会作一回答:原因即在于我希望一切从自己的具体感悟开始,而不轻信现有的结论与依靠现成的理论模式——而这本论文自选集,或许能反映我的上述思路。谨以此书献给予我教益的师长,特别是给我影响尤著的林庚教授、施蛰存教授与已故的马茂元教授;献给一切关心我的海内外朋友们!

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致谢,向刘景琳、肖启明先生致谢!

目 录

自序·····	(1)
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	(1)
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	(24)
上官体及其历史承担·····	(44)
开元十五年前后	
——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	(63)
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	(86)
王维与山水诗由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	(111)
“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	(131)
从王维到皎然	
——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	(160)
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	(181)
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98)
郑谷年谱·····	(214)
八代自然崇尚和骈俪体诗文的关系·····	(245)

意兴、意象、意脉

——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 (269)

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 (300)

主要著述一览表…………… (321)

CONTENTS

Preface	(1)
The Inherent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Qigu Verse in the Early and High Tang Periods	(1)
The Maturity and Style Origin of Qilü of the Early Tang Days	(24)
Shangguan Style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44)
Around the Fifteenth Year of Kaiyuan Era —— On the Forming and Dating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63)
The Northern Gufeng Verse of the High Tang Days and the Poems of Cui Hao, Li Qi and Wang Changling	(86)
Wang Wei and the Style Transformation of Landscape Poetry from Metaphysic to Zen	(111)
The Wuzhong School and Middle Tang Poetry	(131)
From Wang Wei to Jiao Ra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Poetic Style and the Change of Zen around the Zhenyuan Era	(16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i Yingwu and Liu Zongyuan and	